

贵州省农民工城市化对农村的减贫效应

张世兵¹ 丰凤^{※2}

(1. 贵州民族大学 旅游与航空服务学院, 中国贵州 贵阳 550025;

2. 贵州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中国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 选取我国农村贫困问题相对突出的贵州省作为研究案例, 在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构建了基于收入效应与转移效应的农村减贫机制并建立理论模型, 然后以贵州省作为总体考察了这两种效应对贵州全省的农村减贫作用, 同时进一步对模型进行改进, 运用面板数据分析了两种效应在贵州各市州的减贫作用的差异, 从而总结出贵州农民工城市化的基本路径与策略。经研究发现, 贵州各市州收入效应与转移效应的作用差异明显, 经济相对发达的市州应以农民工就地城镇化为核心, 经济欠发达的市州则应以农村经济为重点突破口。

【关键词】 农村; 贫困; 农民工城市化; 收入效应; 转移效应; 减贫; 贵州省

【中图分类号】 F323 . 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8462 (2016) H — 0141 — 05

DOI : 10.15957 / j.cnki.jjdl.2016.11.019

改革开放以来, 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 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然而由于自然地理等原因, 贵州的农村地区贫困问题仍较为严重, 2014 年贵州全省农村贫困人口合计 623 万人, 农村贫困发生率为 18 %。近年来贵州的剩余劳动力不断流出农村, 截至 2014 年底, 贵州地区流向城市的农民工合计为 1449 万人, 占农村户籍人口的比重为 40 . 07 % , 其中流向省内城市农民工合计 631 . 56 万人, 流向省外农民工合计 817 . 44 万人。农民工进入城市成为农民工群体并获得相对高于农村的收入, 但农民工的城市化对贵州农村减贫的作用效力大小以及如何找寻一条有效的农民工城市化路径来破解贵州的农村贫困难题, 是贵州在扶贫工作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1 文献回顾

对于如何减轻农村的贫困状况, 学术界进行了大量探索, 目前文献较多的是研究农村经济增长对农村贫困的减缓作用。如 Dollar 等通过实证发现, 农村经济增长会给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所有农村居民带来收益, 农村减贫的中心任务是农村经济增长^[1]。但近年来, 部分学者将注意力集中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机制方面, 认为农村劳动力由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的转移是农村减贫的重要方法。CFOL Standards 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减贫过程作为样本进行观察, 发现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发展都有助于减少贫困, 但工业部门的高生产率对降低农村贫困的效率比农业部门更高^[2]。林毅夫指出, 农村贫困的原因在于劳

收稿时间: 2016-06-02; **修回时间:** 2016-09-30

基金项目: 贵州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14GZYB15); 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资助项目 (XJK016AZY005)

作者简介: 张世兵 (1968-), 男, 苗族, 湖南龙山人, 博士, 副教授, 高级经济师, 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发展、旅游管理等。E-mail:180623335@qq.com。

※通讯作者: 丰凤 (1979-), 女, 湖南常德人, 博士, 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经济、农发展。E-mail:ffliao0872@163.com。

动力对于农村的大量过剩导致的廉价性，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途径是转移农村劳动力，从而提高劳动力在农村的稀缺性^[3]。William Arthur Lewis 与 Simon Smith Kuznets 均认为农村劳动力的乡城地域转移并流向非农业性生产部门，并且在农民城市化过程中催生出的资源集聚将产生强大的外部性，对农村经济产生巨大影响^[4-5]。

我国目前正在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在城镇化过程中必须实现对农民工的有效转移与吸收，以改善农村贫困状况。侯红娅等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是否转移并进行城市化取决于对进入城市后收入的预期^[6]。Luc Christiaensen 等认为农民进城获得更高收入，提升农村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实现减贫效应^[7]。朱晓等研究指出，非科学的农民工乡城转移并不能真正缓解农民工贫困状况，必须有配套的引导措施，从而解决转农民工城市化后“返贫”的问题^[8]。李群等认为政府对农民工进行心理指导和职业指导对缓解他们的工作压力、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增加他们的留职意愿意义重大^[9]。

贵州是我国贫困问题最突出的省份，也是我国农民工的输出大省，因此研究如何破解贵州贫困难题的文献也相对较多。黄海燕等指出新阶段贵州农村贫困特征主要表现为农村贫困面积广大、脱贫速度减缓、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贫困人口分布与脆弱生态区以及民族区域分布一致、“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特点增加了扶贫开发成本，这些特征使得贵州扶贫开发的难度进一步增大^[10]。龙成丹发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农民收入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促进农民收入结构转变、加大农民增收速度、改善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等方面^[11]。周芳菩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生存方面基本实现了从“温饱”向“小康”的转变，但在发展方面，则面临生存困境、心理困惑、维权危机、社会失范四大难题，农民工城市化过程中存在显著的“经济吸纳”而“社会拒入”的两难困境^[12]。李新智等认为可通过间接支农即对“四化”发展进行财政和资金支持，调控农产品价格，继而促进农户收入增长^[13]。

从近年来的研究结论看，学术界普遍认为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民工城市化都可以实现减贫效应，但对于如何推进农民工乡城转移进而推进城市化减轻农村贫困水平却研究较少。面对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农村人口加速转移，加强对农民工城市化的减贫效应研究，是合理规划人口转移的必然选择。贵州农村贫困问题在我国较为典型，但当前对贵州贫困问题的研究基本停留在定性分析阶段，缺乏定量测算，难以为贵州贫困问题的解决提供准确依据。

2 理论框架

农村贫困减缓的具体因素较多，如农业科技水平提高、政府涉农补贴、金融扶持力度加大等，但其最终都会体现为农村贫困人口的减少。

从逻辑上看，农村贫困人口的减少得益于两个效应：一是收入效应，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增加，贫困线以下的农民绝对数量下降；二是转移效应，农村贫困人口的转移，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中，使得人口结构发生调整，也促进了农村常住居民中贫困人口数量的下降^[13]。如图 1 所示，以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收入为基础建立收入分布函数，最左边的曲线为初始阶段的收入分布曲线，在该阶段农村的贫困人口占比为 AOB 区域，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收入逐渐提高，因此收入分布曲线开始向右移动，农村总人数不发生变化，但贫困人口占比为 COB 区域，因此经济发展使得农村地区 AOC 部分的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AOC 即为收入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部分农村劳动力开始转移到城市，从而使得农村总人口与农村贫困人口基数减少，此时贫困人口占比为 DOB 区域，劳动力的转移使得农村地区 COD 部分的贫困人口减少，COD 即为转移效应。综上，农村减贫是收入效应与转移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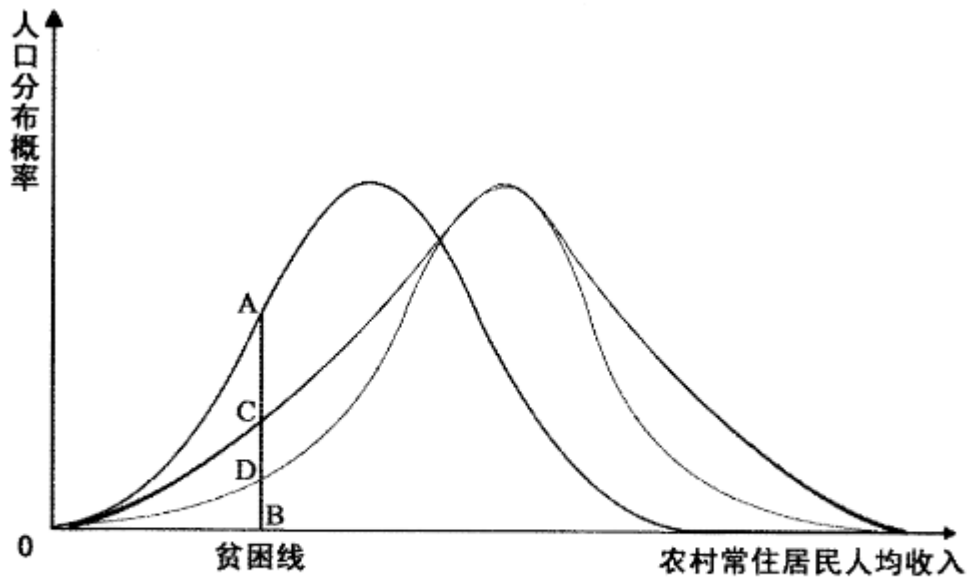


图1 农村贫困减缓效应示意图

Fig.1 The diagram of rural poverty slowing effect

3 模型设定、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3.1 基本模型设定

本文重点考察贵州农民工城市化的减贫效应，通过前文论述可知，农民工城市化主要通过转移效应对农村贫困产生影响，同时农村贫困变动情况还受收入效应影响，因此在构建实证模型时还需引入收入效应作为控制变量，从而更加全面地反映农村贫困情况变动的原因。基本模型如式（1）：

$$P_t = a_0 + a_1 y_t + a_2 r_t + u_t \quad (1)$$

式中： P_t 为农村贫困程度； y_t 为收入效应； r_t 为人口转移效应。

从转移效应看，农民工从农村转移到当地城市（指农民工户籍所在的市州）与转移到异地城市对农村的贫困程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因为转移到当地城市，使得当地城市要素更为集中，城市经济发展后对当地农村经济存在溢出效应，从而拉动农村经济发展，降低贫困程度。因此本文需对转移效应进行分解，将转移效应分为本地转移效应与外流转移效应，从而模型可变为式（2）：

$$P_t = a_0 + a_1 y_t + a_2 br_t + a_3 wr_t + u_t \quad (2)$$

式中： br_t 为本地转移效应； wr_t 为外流转移效应。

在对该模型的运用方面，本文主要分三步进行：

第一步，以全省合计数据为基础，从总体上分析农民工城市化对农村贫困程度的影响。

第二步，基于贵州省各区域间贫困程度的差异，以各市州数据为基础，采用面板模型的方式分析各市州农民工城市化对农村贫困程度的影响。

3.2 指标选取

农村贫困程度指标。反映农村贫困程度的指标通常有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贫困人口收入、贫困指数等，本文要考察的是农村的总体贫困变动情况，选取农村贫困发生率作为反映贫困变动的指标，农村贫困发生率是根据国家划定的收入贫困线标准，测算位于贫困线以下的农民占农村常住居民的比重，能较好反映农村的贫困深度与广度。因我国自 2008 年以来，多次修改贫困线标准，因此贵州省历年统计年鉴中的农村贫困发生率的统计口径存在不一致性，为便于分析，本文以 2007 年的贫困线为标准，结合农村人口收入分布情况，对 2008 年以来的农村贫困发生率进行了修正^[14]。

收入效应指标。收入效应带来的农村贫困程度的降低，虽然其原因在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最终反映为农村常住居民收入的提高，因此本文以贵州省历年统计年鉴上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作为反映收入效应的指标。

转移效应指标。农民工的城市化程度主要体现在农村人口的净流出量，本文选取农村人口净流出量的增长率作为转移效应指标，其中流入到本地城市的人口增长率为本地转移效应，外流到其他城市的人口增长率为外流转移效应。农村人口净流出量等于农村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和减去农村常住人口，因农村非户籍人口数量较小且贵州统计年鉴中未披露，因此本文在计算时忽略非户籍人口因素，假设农村人口净流出量等于农村户籍人口减去农村常住人口。

3.3 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区间为 2006—2014 年，数据均为年度数据，总期数为 9 期。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贵州省历年统计年鉴。

4 实证分析与结果说明

4.1 基于贵州全省的总体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从总体上对贵州省农民工城市化的减贫效应进行考察，如图 2 所示，从四个指标的变化趋势看，贵州从 2006 年以来，农村贫困发生率迅速下降，农村常住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则一直保持在 8%—12% 的稳定区间内，农民工外流虽然每年均处在增长状态，但增长率迅速下降，流入本地城市的农民工数量在 2006—2013 年一直在减少，但趋势逐渐减缓，至 2014 年，农民工流入本地城市的数量开始呈现增长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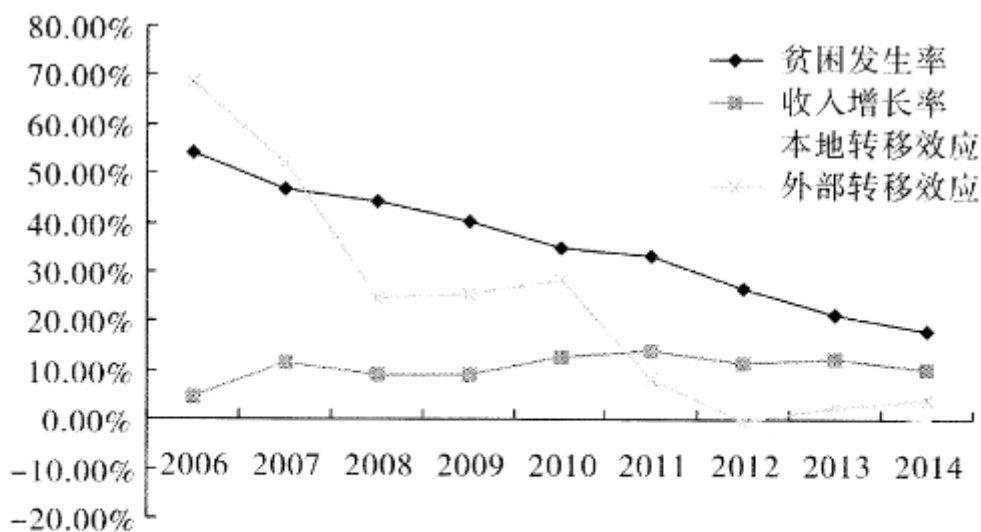


图2 模型指标变量变化趋势

Fig.2 The changing trend of model index variables

为准确计量收入效应与转移效应对贫困的影响，将贵州省历年数据代入（2）式中，采用最小二乘估计法对参数进行估计，结果如式（3）：

$$P_t = 0.3353 - 1.0577 \cdot y_t - 0.9208 \cdot br_t + 0.2985wr_t + u_t \quad (3)$$

模型的可决系数为 0.8667，说明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较好。

从参数估计结果看，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贫困发生率存在明显的反向相关关系，即人均可支配收入每提高 1.0577 个百分点，其产生的收入效应就可使贫困发生率下降 1 个百分点。

从转移效应看，本地转移效应与外流转移效应对贫困发生率的作用效力相反。农民工由农村向本地城市转移的人口每提高 0.9208 个百分点，则贫困发生率相应降低 1 个百分点；而向外地城市转移人口每提高 0.2985 个百分点，则会使贫困发生率增加 1 个百分点。这从侧面说明了本地乡城转移对农村经济产生了较大的正向溢出效应，本地城市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缓解了农村的贫困状况，而农民工流入到外地城市，不但不能帮助农村脱贫致富，反而抽走了农村大量劳动力资源，同时由于流出空间距离较远，也割裂了农民工同农村的经济联系，使得农村经济发展下滑，农村贫困程度加深。从变化趋势图中也可看出，向外地转移人口的增长率确实与贫困发生率存在同向变动关系。

4.2 基于各市州数据的面板模型分析

贵州省各市州经济存在较大差异，从而使得每个市州外流的农民工也相差较大，如省会贵阳为农民工净流入城市，其他的则为净流出城市，同时各市州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差异明显，2014 年，贵阳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0826 元，排名全省第一，而排名最后的黔东南州则只有 6139 元，二者相差达 1.76 倍。这些因素导致各市州的农村贫困程度也存

在巨大差异，2014 年贵阳市农村的贫困发生率仅为 1 . 37 % ，而黔东南州则为 26 . 58 % ，二者相差 19 . 4 倍。为了考察收入效应与转移效应在各市州减贫过程中的不同作用，本文接下来将采用各市州的面板数据对农民工城市化的减贫效应作进一步分析。

引入面板数据后，为检验各市州的情况差异是否对原模型的参数估计存在影响，可分别采用混合回归模型、变截距模型与无约束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从而选取最优的估计模型与估计参数。

① 在混合回归模型下，原估计方程的截距项与系数均不随个体变化而变动，从而新的估计方程为式（4）：

$$P_{it} = a_0 + a_1 y_{it} + a_2 br_{it} + a_3 wr_{it} + u_{it} \quad (4)$$

其中下标 it 表示个体 i （各市州）在第 t 期的观测值。

回归结果显示，该估计方程的可决系数为 0 . 3122 ，且系数 α_2 的 t 值检验为不显著。

② 在变截距模型下，原估计方程的截距项随个体变化而变动，但系数不随个体发生改变，从而新的估计方程为式（5）：

$$P_{it} = a_{i0} + a_1 y_{it} + a_2 br_{it} + a_3 wr_{it} + u_{it} \quad (5)$$

回归结果显示，该估计方程的可决系数为 0 . 6915 ，且系数 α_2 的 t 值检验为不显著。

③ 在无约束模型下，原估计方程的截距项与系数均随个体变化而变动，从而新的估计方程为式（6）：

$$P_{it} = a_{i0} + a_{i1} y_{it} + a_{i2} br_{it} + a_{i3} wr_{it} + u_{it} \quad (6)$$

回归结果显示，该估计方程的可决系数为 0 . 7836 。

经比较发现，在采用混合回归模型与变截距模型的情况下， α_2 的 t 值检验均不显著，这也反映了各市州农民工的本地转移效应对减贫的作用存在较大差异。无约束模型下的参数估计结果见表 1 。

表 1 无约束模型下参数估计结果
Tab.1 Parameter estimation results in unconstrained model

城市名称	α_0	α_1	α_2	α_3
贵阳市	0.0691	-0.0253	0.7127	0.3573
六盘水市	0.0560	-0.0773	-0.1711	-0.0303
遵义市	0.1618	-0.0733	-0.2744	-0.1977
安顺市	0.1628	-0.0662	-0.1104	-0.0469
毕节市	0.1025	-0.1782	-0.1562	-0.0829
铜仁市	0.2300	-0.8488	-0.0985	-0.0965
黔西南州	0.1550	-0.7563	-0.5991	-0.2135
黔东南州	0.1457	-0.6477	-0.0079	-0.2876
黔南州	0.1879	-0.0993	-0.1501	-0.1831

4.3 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模型回归结果可知：

① 各市州的收入效应对农村减贫均存在正向相关关系。这一结果与上文用贵州全省的数据拟合出来的结果一致，表明在贵州的各个市州，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都能促进农村贫困程度的降低。

② 省会贵阳农民工城市化的本地转移效应与外流转移效应均不明显。从参数估计结果看，贵阳的农民工城市化并不能对农村起到减贫的作用，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贵阳的农村贫困程度远低于省内其他城市，农村贫困人口基数低，农村贫困发生率对农民工的转移不敏感；二是贵阳农村的经济相对发达，如果单纯只是为了脱离贫困线，在当地农村较为容易实现，无需转移到城市。

③ 贵州省多数城市的本地转移效应对减贫的作用要强于外流转移效应。从参数估计结果看，除贵阳外，其他 8 个市州的本地转移效应与外流转移效应均对农村贫困具有明显的减弱作用。将两种效应进行对比发现，8 个市州中，六盘水市、遵义市、安顺市、毕节市、铜仁市、黔西南州等 6 个市州的本地转移效应要大于外流转移效应，说明在这些地区，农民工直接流入到本地的城市更有利于农村的减贫进程。而在黔东南州与黔南州，由于当地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因此农民工外流带来的减贫效应比流入当地城市更为明显。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农村贫困的成因出发，以贵州作为样本，分析了农民工城市化对于农村减贫的作用。经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农村贫困的减缓是收入效应与转移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村常住居民收入的提高可以减少农村的贫困人口，农民工从农村流向城市要素生产率更高的部门，同样能实现农民贫困发生率的降低；二是贵州经济发达地区的转移效应并不明显，经济相对发达的省会贵阳，农民即使不转移到城市，也同样可以通过收入效应降低贫困发生率；三是本地转移效应与外流转移效应在的作用效力在不同地区存在较大差异，通过贵州省总体数据的分析，本地转移效应与外流转移效应对农村贫困程度的缓解均具有正向作用，但具体到每一市州，则表现出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本地转移效应较强，而在经济相对滞后地区则外流转移效应的减贫作用更大。

贵州是我国农村贫困问题较为突出的省份，也是农民工输出大省，贵州在农村减贫的进程中，必须紧抓农民工城市化这一核心，实现精准扶贫。首先要逐步改变农民工不断流出贵州、流向沿海发达省份的现状，采用政策鼓励、创业扶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措施，优化省内农民工就业环境，逐步引导农民工从省外回流；其次要坚持差异化的农民工转移策略，在经济发达地区，要重点推进农民工就地城镇化策略，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向本地城市转移，同时大力加强县域、乡镇中心建设，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扶贫的核心任务是加大对农村经济的扶持力度，以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同时转移部分劳动力至其他经济相对发达的市州二第三，强化城市经济对农村的溢出效应，利用农民工与农村的天然纽带关系，增强城市与农村经济的联系，推动农村经济的市场化、特色化、品质化进程。

参考文献:

- [1] Dollar D , Kraay A . Growth is good for the poor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 2002 , 7 (3) : 195 — 225 .
- [2] CFOL Standards . China ' s Productivity Performance and its Impact on Poverty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C]//Centre for the Study of Living Standards , 2003 .
- [3] 林毅夫. 解决农村贫困新战略[J]. 中国经济周刊, 2002 (35) : 24 — 24 .
- [4] Lewis W A .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J]. Manchester School , 1954 , 22 (2) : 139 — 191 .
- [5] Kuznets 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equalit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1955 , 45 (1) : 1 — 28 .
- [6] 侯红娅, 杨晶, 李子奈. 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实证分析[J]. 经济问题, 2004 (7) : 52 — 54 .
- [7] Christiaensen L , weerd J D , Todo Y Urbaniz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 the role of rural diversification and secondary towns [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 2013 , 44 (4 — 5) : 435 — 447 .
- [8] 朱晓, 段成荣. “生存—发展—风险”视角下离土又离乡农民工贫困状况研究[J]. 人口研究, 2016 (3) : 30 — 44 .
- [9] 李群, 杨东涛, 卢锐. 指导关系对新生代农民工离职— 工作满意度的中介效应[J]. 经济地理, 2015 , 35 (6) : 168 — 174 .
- [10] 黄海燕, 王永平. 新阶段贵州农村贫困特征与反贫困策略调整[J]. 贵州农业科学, 2010 , 38 (7) : 204 — 208 .
- [11] 龙成丹. 贵州省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基于贵州三县的调查[J]. 生态经济评论, 2012 (第三辑) : 22 — 25 .
- [12] 周芳苓. 生存与发展: 对贵州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证研究[J]. 毕节学院学报: 综合版, 2012 , 29 (12) : 90 — 94 .
- [13] 刘新智, 刘雨松, 陈政, 等. “四化”同步发展对农户收入增长的效应及空间差异[J]. 经济地理, 2015 , 35 (9) : 165 — 171 .

[14] 单德朋, 郑长德, 工英. 贫困乡城转移、城市化模式选择对异质性减贫效应的影响[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 25 (9) : 81 — 92 .

[15] 杨立雄. 贫困线计算方法及调整机制比较研究[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0 (5) : 52 — 62 .